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党史研究资料

(一九七九年第一至九期)

一九七九年十月翻印

说 明

为供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翻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七九年第一至九期）》，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一)

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	(1)
瞿秋白同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言.....	(4)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7)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12)
天津“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化名.....	(18)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 评价讨论会(史学动态).....	(19)

(二)

列宁论普列汉诺夫.....	(23)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29)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33)
关于朱德同志早期经历的几件史实的订正.....	(37)

(三)

毛主席创办文化书社.....	易礼容 (41)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	包惠僧 (45)
关于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	(50)
关于彭湃同志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入党的时间问题	(56)
关于李少石同志之死.....	(60)
美军观察组简介.....	(63)

(四)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65)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	(69)
关于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城和召开遵义会议的时间.....	(86)
新安旅行团简介.....	(91)

(五)

毛泽东等同志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的背景.....	(94)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包惠僧	(98)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其中的共产党员.....	(103)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斗争.....	(111)
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116)

(六)

李维汉同志谈党史资料的搜集工作.....	(119)
党史陈列的几个问题.....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	(122)
张维桢同志谈湖南早期工运.....	(129)
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	(134)
陈潭秋同志战斗在顺直省委.....徐彬如	(144)

(七)

有关“马日事变”后农军进攻长沙问题的部分材料	(150)
一、“马日事变”后中央对湖南工作的方针.....	(151)
二、“马日事变”前后的湖南省委.....	(154)
三、农军进攻长沙.....	(160)
1. 谁决定进攻长沙?	

(1) 说是省委应变组织决定的

(2) 说是郭亮、柳直荀同志决定的

(3) 说是其他同志决定的

(4) 说是浏、醴、平、潭、岳几县互相联系决定的

2. 浏阳农军开赴长沙; 醴、潭自行溃散; 平、岳反对进攻; 长沙城内未响应

3. 省委撤销进攻长沙计划

附: 农军进攻长沙时的敌我力量……………(171)

(八)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174)

广州历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概况……………夏燕月(181)

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187)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林谷良(197)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包惠僧**(201)

(九)

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206)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

的初步考证……………邵维正(209)

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罢工中是有功绩的……沈庆林(221)

党史研究资料

(一)

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

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四年三月香港波文书局出版的严静文著《周恩来评传》上刊登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身份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信的影印件，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法国帮助国民党改组，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的一些情况。此外，台湾伪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出版的王章陵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中也转引了一些中共旅欧支部帮助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以及周恩来同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资料。这两本书，观点反动，但所引载的原始资料大致可靠，现据该二书所引资料及其他资料将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简介如下：

一九二二年八月，国民党总部派王京岐去法国筹组国民党总支部。当时，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协助王京岐工作。^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曾多次与王京岐取得联系。一九二三年三月，国民党代表参加了巴黎举行的共青团旅欧支部常会，研究共青团旅欧支部成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四月，共青团旅欧支部派代表至里昂和国民党代表进一步商谈。一九二三年四月，王京岐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长孙竞等

的信中有如下记载：

“兹有请示者：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因斯之故，曾与多次接头，前月十号特派代表赴巴黎参与他们的常年大会，他们大部分意见欲加盟本党，或与本党携手合作。前天接他们来信，特派二个代表来里昂会商一切，其结果如何，来日再报。”②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和尹宽、林蔚代表共青团旅欧支部至里昂与国民党代表王京岐商谈并达成协议。王京岐第二天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的报告中说：“昨天开会结果很好，旅欧少年团八十余人极端赞成本党宗旨，一概加盟本党”。③

一九二三年八月，王京岐回国，他在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工作的信中说：“周等三人（指周恩来、尹宽、林蔚——引者注）先加盟本党，以表诚意，并请委巴黎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分部筹备员”。④

在王京岐回国前，周恩来同志曾写信给他，对于旅欧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提出建议：“我们先说在欧的事，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只是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目下的事，如在欧党势力的扩充，党员的训练，刊物的印行，革命工作的策划，均宜着手进行。前二

事我们感于国民党之不振，在欧求学时代，实宜于此点多努力。后二事你此番归国宜和党中干部及总理孙先生多多商榷，最要的，如何使此在欧的党员有所事事，其尤要的便是刊物经费的筹措。”⑤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批评了国民党腐败现象。⑥周恩来同志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的总务主任，李富春同志为宣传主任。在王京岐归国期间，周恩来同志即负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实际责任。

周恩来同志受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之后，即着手进行巴黎区分部（即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筹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三十一人。周恩来同志以通讯处筹备员身份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讯处临时主任李富春同志报告了巴黎党务的发展情况。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通讯处规约，选举了通讯处职员，聂荣臻同志被选为通讯处处长。会议次日，周恩来同志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报告通讯处筹组和成立情况。信中说，“通讯处大会情形大致如上述，正式职员且已举出，此后当由干事会负责向支部报告其进行状况，再由支部转达总部。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总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⑦

一九二四年七月，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⑧

【注】

- ① 饶竟群回忆 1976年12月25日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 ② 王京岐致孙竞、郑达佛函 1923年4月25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 ③ 王京岐给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报告 1923年6月17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 ④ 王京岐向孙中山、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党务部报告书 1923年8月（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 ⑤ 周恩来致王京岐函（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 ⑥ 《旅欧中国国民党支部第一次大会报告书》（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 ⑦ 周恩来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信 1924年1月18日（见严静文《周恩来评传》）
- ⑧ “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摄影”（见严静文《周恩来评传》）

瞿秋白同志为《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写的序言

编者按： 我馆藏有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长江书局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此报告曾全文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出版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战士》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以及三十八、三十九期上。同年三月十二日的中共中央机关刊《响导》第一九一期登载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以后没有继续刊登。据杨之华同志回忆，这是由于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的压制。当时同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考察报告非常重视，主张在《响导》上继续登完，但为彭述之所拒绝。于是瞿秋白同志即将此文交我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并且写了序言，热情赞扬了这篇报告。现将该序言刊登于下。

《湖南农民革命》序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便是土匪和官僚。土匪是革命党，官僚便是地主土豪的代表。当然，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等到他得志了，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官僚来压迫平民，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将力争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

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刑。这些齷齪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难道这些做过分么？当然，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但是战场拼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甚么？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而且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么打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纳税。但是，第一，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第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国家，其他一概不能管。他们耕田纳税之外，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不平等条约”。“率土之滨莫非农土”！中国境内，不要有一个农民纳甚么地主的租；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不能承认“不自耕作坐收田租”的人。这就叫做土地国有。农民自己耕三亩田，享用三亩，耕五亩享用五亩，——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不能承认地主——这就叫做转地农有！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

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

一九二七·四·十一夜二时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在一些出版物中，一般都说中共“一大”的代表为十二人，按地区分，计为：

长沙：毛泽东 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 陈潭秋

上海：李 达 李汉俊

济南：王尽美 邓恩铭

北京：刘仁静 张国焘

广州：陈公博

东京：周佛海

但当事人回忆有不同说法。有回忆十二人的，也有回忆十三人的。回忆材料的分歧点，主要在包惠僧身上。现将各种不同说法分述如下，供参考。

一、毛泽东、董必武同志的回忆，前后说法不同。

根据毛泽东同志口述，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

写道：“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人是：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总共是十二个。”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讲话中说：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坐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另一个就是我。好几个牺牲了，如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李汉俊；湖北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这些都牺牲了。后来当了叛徒、汉奸、反革命的有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后两个人还活着……还有另一个是李达……。”

根据董必武同志口述，韦尔斯·斯诺在《老赤卫队员的传记》中写道：“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一个代表省派两名代表，日本留学生派了一名代表——周佛海。此人以后叛变加入国民党。湖北派陈潭秋和我为代表。湖南派何叔衡（后来在红军工作时，大概与瞿秋白同时在一九三五年被杀害）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做为代表，刘现在是托派。上海派李汉俊做代表，一九二七年在汉口被杀害；还有李达，现在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武大任教。广东派陈公博做代表，此人叛变，担任南京实业部长；还有包惠僧，也在国民党内政部任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同王尽美，这两个人后来都被杀害。共产国际派两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一是荷兰人，我们中国话称他为马林；另外一个俄国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董必武同志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夕回答《新观察》主编欧阳柏访问时说：“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上已经发表的很多。不过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

个，在我的记忆里，却好象是十三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人。”

董必武同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在《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中说：“‘一大’的代表，上海、济南、湖北、湖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人，有的讲是十三人。”

二、李达和刘仁静回忆代表为十二名，包惠僧参加了会议，但不是代表。

李达同志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说：“六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名单如上表，略）

李达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党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七月一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当时广州只有三个党员：陈公博、谭平山、陈达材）。”

刘仁静一九五七年三月回忆说：“一大代表是十二人，

李达的回忆较正确，包惠僧不是代表，他在开会前后经常出入于诸代表房间，也到过会场，可能是列席或旁听。”（刘回忆的代表名单同上表，略）

三、陈潭秋同志等四人回忆代表为十二人，其中有包惠僧。

陈潭秋同志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说：“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广东的代表为包怀琛（编者：即包惠僧）……。还有代表北平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中说：“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我是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编者：即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悉。”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

叔衡先生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四、包惠僧回忆代表为十三人，其中包括他自己。

包惠僧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回忆说：“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在开会时统计出席的代表有七个地区，共十三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

上述九人的回忆材料，说包惠僧曾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几乎是一致的。只有毛泽东同志在“九大”讲话时没有提到包，而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主席当时回忆的代表中是有包惠僧的。

关于包惠僧是否正式代表的问题，则有不同意见。九人中，李达、刘仁静坚持说包不是代表。董必武同志三次回忆中，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五六年的回忆说包是代表，一九七一年的回忆说包是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议。其余六人（包括毛主席早期的一次回忆）则说包是代表。

至于代表的人数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的问题，则取决于包是否具有代表资格，包如不是代表，则为十二人；如是，则为十三人。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按照当时情况，包以非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说法，似觉牵强。代表为十三人的说法，则比较接近事实。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编者按：自一九七八年八月开始，中国革命博物馆连续访问了罗章龙教授。现将他谈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情况综合整理后刊登于下。整理稿经本人阅过。

罗章龙教授谈的其他问题，将陆续在本刊刊登。

六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象春雷一样，震撼着中国大地，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当时的中国虽然经过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民族危机深重，人民灾难无穷，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是必然要爆发的。

五四期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以后，聘请了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生来校当教授。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使各个方面的人物都云集北大；同时经过几次考试，招收了大批优秀学生。这样，北大不仅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学术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我在北大文学院本科读书，是系学生会的成员。那时，北大学生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